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211”工程项目出版资助

王家平 / 著

20SHIJI ZHONGGUO WENXUE YICHAN

20世纪中国文学遗产的考量 De Kaoliang



武汉出版社
WUHAN PUBLISHING HOUSE

京华学术文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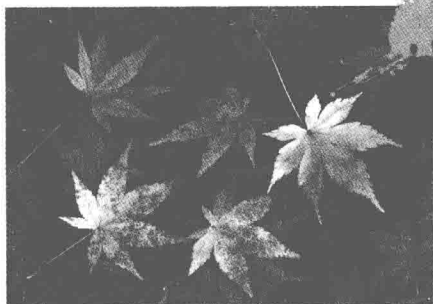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211”工程项目出版资助

王家平 / 著

20SHIJI ZHONGGUO WENXUE YICHAN

20世纪中国文学遗产的考量

De Kaoliang



武汉出版社
WUHAN PUBLISHING HOUSE

(鄂)新登字 0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遗产的考量/王家平著.

—武汉:武汉出版社,2011.1

ISBN 978-7-5430-5580-3

I. ①二… II. ①王… III. ①鲁迅著作—文学研究②鲁迅(1881~1936)—人物研究

IV. ①K825.6②I210.9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63072 号

著 者:王家平

责任编辑:雷方家

封面设计:刘福珊

出 版:武汉出版社

社 址: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 103 号 邮 编:430015

电 话:(027)85606403 85600625

http://www.whcbs.com E-mail:zbs@whcbs.com

印 刷:武汉市楚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25 字 数:400 千字 插 页:2

版 次: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8.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目 录

第一编 鲁迅精神世界凝望

回归人世的鲁迅

- 对一个 20 世纪文化偶像的再认知 (3)
- 被遗忘、被鉴赏、受迫害、被“吃”
 - 鲁迅对先驱者充当“牺牲”悲剧命运的体认 (12)
- 彷徨于真话与谎言之间
 - 鲁迅对知识分子“言说”困境的体认 (26)
- 永世流浪与过客境遇
 - 鲁迅对精神探索者生存方式和悲剧命运的体认 (37)
- 鲁迅与基督教文化 (50)
- 鲁迅与道教文化 (60)
- 鲁迅宗教文化思想综论 (73)
- 再论鲁迅与中外宗教文化 (83)
- 鲁迅性学思想论略 (95)

第二编 鲁迅精神遗产的传播与接受

-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鲁迅研究的生态系统 (111)
- 新世纪鲁迅研究的难题和学术生长点 (138)
- 20 世纪前期欧美的鲁迅翻译和研究 (146)
- 20 世纪 90 年代以降西方鲁迅研究的基本走向 (160)
- 世纪之交西方鲁迅研究的新趋势(上) (172)
- 世纪之交西方鲁迅研究的新趋势(下) (185)
- “竹内鲁迅”的范式、特质、影响及其对它的超越 (194)
- 百年来鲁迅在世界上传播的区域格局及其重要学派 (210)
- 在阐释与抵抗阐释张力下的鲁迅遗产 (221)

第三编 中国现代文学考量

- 许地山创作特色再论 (237)
- 缔结人与城的精神契约
- 评赵园的《北京：城与人》 (244)
- 在历史体验与现实关怀之间 (249)
- 诗与史纠葛中的文学史写作
- 评洪子诚的《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 (252)
- 关于“重写文学史”问题的述评 (259)
- 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流派研究述评 (266)

第四编 “文革”时期诗歌论辩

- “文革”时期主流诗歌理论体系的建构 (277)
- 红卫兵小报及其诗歌基本形态 (286)
- 红卫兵诗歌时空意象的神话原型 (296)
- 节日庆典与广场狂欢
- 红卫兵诗歌的精神特质之一 (306)
- “文革”时期流放者诗歌简论 (323)
- 2 存在境遇和生命哲学的诗性传达
- 再论“文革”时期流放者诗歌(一) (336)
- 在苦难中探寻获救之路
- 再论“文革”时期流放者诗歌(二) (349)

附录 艺术论评及其他

- 贝多芬：靠心灵而伟大的人
- 纪念贝多芬逝世 180 周年 (361)
- 民族艺术教育的新收成
- 彝族画家俄狄史卓作品审美功效论 (364)
- 在鲁迅周边世界的朱安
- 朱安年谱初稿 (372)

- 后 记 (396)

第一编 鲁迅精神世界凝望



回归人世的鲁迅

——对一个 20 世纪文化偶像的再认知

生前的落魄窘困与死后的声名显赫,似乎是所有思想文化先驱的普遍命运模式。鲁迅曾深有感触地说过:“豫言者,即先觉,每为故国所不容,也每受同时人的迫害,大人物也这样。他要得人们的恭维赞叹时,必须死掉,或者沉默,或者不在眼前。……待到伟大的人物成为化石,人们都称他为伟人时,他已经变了傀儡了。”^[1]从孔子的奔逃于列国到屈原的怀沙自沉,从苏格拉底的服毒身亡到布鲁诺的烈火焚身,中外文化史上无数事实无不显示了先驱者在人世中的悲剧遭遇。鲁迅的这种悲剧体验得之于他本人一生的坎坷与不幸,而世人对已逝的鲁迅的顶礼膜拜则成了这一古老文化命题更具悲剧意味的现代注释。鲁迅生前阅尽人世的悲欢和世态的炎凉:官府的迫害接踵而至,论敌的围攻四面而来,他暴怒,他躲闪;亲人和朋友的误解、隔阂乃至背弃遍布周遭,他欲哭无泪,他的心在滴血……

鲁迅去世至今已 70 多年。在这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里,鲁迅一步步被推上了“神圣的祭坛”,享尽了人间世俗的香火和供品,成为 20 世纪中国最为显赫的文化偶像。

然而一旦我们抛弃了过去那种对鲁迅庸俗化、神圣化的认知模式,一旦我们以平等的视角面对鲁迅,便会产生新的困惑和茫然。鲁迅的思想太丰富了,鲁迅的性格太复杂了。在鲁迅的身上,有太多的矛盾和“悖谬”。他是坚忍不拔的反封建斗士,同时又是听从母命,与自己根本不爱的小脚女子拜堂成亲的“孝子”;他是传统道德的叛逆者,然后当爱神叩击他心灵的门窗时,他又显得那般地犹疑、怯懦和畏惧;他一向乐于助人、牺牲自我,却又举起复仇之剑,攻杀仇敌和亲朋;他不断地同虚无、绝望抗争,却无时无刻地生存于“精神的囚室”之中……一系列的矛盾和悖反,撕扯着鲁迅那颗异常敏感脆弱的心灵,把他推向了人间最痛苦的精神炼狱,并使他过早地离开了人世。然后这也铸就了鲁迅犀利无比的思想锋芒、深刻精敏的感知力和“残酷的天才”那般的文学表现力。

深入到鲁迅作品的艺术世界中去,走进他丰富的心灵王国里去,最吸引我们的恐怕是他作为一名 20 世纪的中国人由爱与恨、悲与欢交织而成的情感状态和复杂的心理结构。

爱,是生命存在的本质力量,它使得种族得以繁衍而生生不息,它能激活个体的高尚情感和创造热力。然后,爱更是一座精神的十字架,它交织着欢悦与悲哀、酣畅与沉痛、希冀与绝望。在鲁迅心灵的领地上,就矗立着一座爱的十字架。作为人之子、人之兄、人之夫,鲁迅不断地成为悬挂在爱的十字架上的“受难者”。

服饮了慈母误进的毒药

母亲,多么神圣的字眼;母爱,人世间最纯洁无私的情感。然而,母爱也可能成为子女的“精神囚室”,使他们逡巡不前,令他们尝遍苦痛。鲁迅 1925 年曾在《杂感》一文中感叹道:一个人若死于敌手,这并不足以悲哀,最大的悲哀是“死于慈母或爱人误进的毒药”^[2]。

鲁迅带着自身的情感体验,道出了这番人生的沉痛。在鲁迅的少年时代,祖父因科场案发而进了监狱,接着父亲又撒手人寰,家庭的重担就全压在了母亲鲁瑞瘦弱的肩上。在世人的冷眼里,在族人的倾轧下,母亲忍辱负重、含辛茹苦地抚养着 5 个孩子(鲁迅有一弟一妹在幼时夭折),勉强支撑着日趋败落的周家。作为周家的长孙、长子,鲁迅充分感受了母爱的圣洁伟大。晚年的他还多次对青年作家萧军说:“我的母亲是很爱我的。”^[3]母爱成了鲁迅寂寞人生中巨大的精神慰藉,也成了一笔永世难偿的道德债务。

为了报答母亲,他以母亲的姓氏为自己起了“鲁迅”这一笔名。留日时期,作为光复会成员的鲁迅,曾被委派回国刺杀清朝官员,临行前他问:“如果我被抓住,被砍头,剩下我的母亲,谁负责赡养她呢?”^[4]鲁迅并非贪生怕死,然而对母亲的爱使他产生了片刻的犹豫,这导致光复会领导取消了派他回国行刺的计划。从此,他的心灵深处投上了一道难以抹去的阴影。

母爱也影响了鲁迅的职业选择。他的政治立场与封建官僚是尖锐对立的,道不同则不相谋,按照他的个性来说,应该避免与这些统治者共事才是。然而从 1912 年至 1926 年,他一直未能脱离官场。20 年代中期,鲁迅的论敌陈西滢攻击他“从民国元年便做了教育部的官,从没脱离过。所以袁世凯称帝,他在教育部,曹锟贿选,他在教育部……”^[5]这番刻薄的言词多少击中了鲁迅的痛处。那么他为什么要这样委屈自己呢?鲁迅在 1925 年一封致青年朋友的信中透露了他的苦衷,他说自己“只能不照自己所愿意做的做,而在北京寻一点糊口的小生计,度灰色的生涯。因为感谢别人,就不能不慰安别

人,也往往牺牲了自己”^[6]。这里所说的别人,主要是指母亲。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要想寻到一个较稳定的职业谈何容易?为了赡养老母,鲁迅不得不做自己所憎恶的官员。这又使鲁迅承受多么沉重的精神压力啊!

更大的精神重压还来自于母亲对他的婚姻的强制性安排。1906年,“母亲病危”的电报把鲁迅从日本召回国内。回家后,他才发觉这是一个圈套,母亲身体好好的,召他回来是让他与朱安完婚。朱安是一名目不识丁、裹着小脚的旧式女子,她万不能为饱受了西方新思潮洗礼的青年鲁迅所接受。但是母亲相中了朱安,认为她比家族里的姐妹和媳妇都贤惠。鲁迅也作了抗争,然而一看到慈母满头的白发和满脸的悲哀,他的心快碎了,他必须做出最大的退让。一切都按古老的婚礼仪式进行,鲁迅头戴假辫,身着长袍马褂,像木头一般与朱安拜完堂,并走进了洞房。4天后,他撇下新娘匆匆前往日本。回到东京后,鲁迅沉痛地对挚友许寿裳说:“婚姻是一件母亲送给我的礼物,我只好好地供奉它,至于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7]为了尽孝,为了慰藉母亲孤寂的心,鲁迅做出了一生中最大的牺牲,从此,他把自己绑在里封建婚姻的柱子上,尝尽了无爱的夫妻生活的痛苦。母亲起初根本未意识到自己的专断如此深深地伤害了长子,20多年后,他才多少意识到自己当年强迫长子成婚给他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可是为时晚矣!她误进的“毒药”已经被儿子喝下。

鲁迅是周家的长孙、长子,也是弟弟们的长兄。作为人之兄,他又背起了爱的十字架。

东有启明,西有长庚

《诗经》的诗句:“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描述了一种自然天象,启明和长庚皆为金星的别名,分别指代金星在凌晨和黄昏时所处的不同位置,后人借用这两句诗比照兄弟失和。鲁迅周岁时,父母亲按绍兴习俗把他抱到长庆寺,拜一名姓龙的住持和尚为师,龙师父给他起了一个“长庚”的法名,而他的二弟周作人后来则以“启明”为字。难道鲁迅和二弟的名号暗示了后来兄弟关系彻底破裂具有某种天意?

鲁迅对弟弟一向是疼爱有加。父亲去世后,他在弟弟面前扮演着父、兄双重角色。二弟周作人只比他小4岁。幼时,他们就是形影不离的好朋友。他们少年时代的诗文总透露着一种亲密无间的感情。1906年回国完婚后不久,鲁迅把二弟作人带到日本留学,在异国他乡,他们互相关怀,相濡以沫。他们一起筹办《新生》杂志,共译《域外小说集》,共同的兴趣、爱好和理想,使兄弟二人成为文学上的知音。1909年,周作人即将与日本姑娘羽太信子结

婚,而国内的老母也难以支撑衰败的家庭,为了尽到长子、长兄的责任,鲁迅忍痛打消了赴德国留学的念头,回到国内谋职养活全家,每月还给羽太信子一家寄去60元的生活费。经过长时间的单身生活后,鲁迅与已担任北京大学教授的周作人于1919年底把全家迁到北京,他用四处兼职、多方借贷凑足的一大笔钱,在西城八道湾购置了宽敞的宅院,从此做起了安度大家庭生活的美梦。

不过,现实是残酷的,鲁迅心中这片仅剩的“人性乐土”不久就彻底沦丧。1923年7月中旬,周家大院发生了严重的“内讧”,二弟及其妻子羽太信子与鲁迅闹翻了。鲁迅在事发的7月14日的日记中用寥寥数语记载了这场冲突:“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8]5天后,周作人交给鲁迅一封绝交信,内中写道:“鲁迅先生,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9]关于这场“家庭内战”的起因,至今仍是学术界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其中的两种具有代表性的说法可备参考。其一是“信子离间”说:鲁迅对管理家政的二弟媳羽太信子的铺张浪费、不知节俭多次给予批评,她就污蔑大哥对她“非礼”,周作人听信谗言,中了离间之计;其二是“信子原为鲁迅情人说”:鲁迅留日期间即与信子同居,后因与朱安结婚,就把信子介绍给二弟为妻。作人起初不明虚实,至事发前才得知“真相”。前一种说法有一定的材料依据而为人们所普遍接受,后一种说法因缺乏有力的证据而难为广大学者认可。不管怎么说,这兄弟二人从此是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冲突半个月后,鲁迅迁出了八道湾寓所。几个月后,他回旧居取自己心爱的书籍,愤怒的周作人竟然举起一个铜制香炉向兄长砸来,幸亏友人及时劝阻,才避免了一场流血冲突。

这场冲突使周氏兄弟二人产生了深刻的信任危机。就鲁迅一方来说,他为二弟作出了那么多的牺牲,本也不指望恩恩相报,只要二弟能与自己长相知也就知足了,却未料竟落到恩将仇报的地步。鲁迅悲痛万分。在随后的三年里,鲁迅一直处于十分孤独而绝望的境地。《野草》集里的散文诗充分显露了这种情绪。

正当鲁迅孤苦无告之际,爱神之箭射中了他。44岁的鲁迅真正品尝了爱情的甘美,一颗冰冷的心终于得到了女性的温存。然而,伴随着爱之欢欣与愉悦而来的是疑虑、自卑乃至怯懦。爱情不仅仅是芬芳甘甜的,鲁迅更深刻地体味了爱的苦涩,他再度被推向十字架。

“异性,我是爱的,但我一向不敢”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鲁迅与朱安度过了近20年毫无爱情的夫妻生活。

自然,鲁迅身边也不乏女性的身影,他那个冷寂的家中常有女师大学生青春的笑声传出。在这群女生中,勇敢地向鲁迅放出“爱之箭”的是许广平。从此,鲁迅陷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爱情“拉锯战”。

“战事”发端于1925年3月11日。那天,许广平给鲁迅寄去第一封信,请求先生给她一个“真切的、明白的指引”^[10]。这是一封普通的师生往来信件,然而在信的末尾,许广平有意提醒先生自己是位女生。或许她担心先生把自己误为男生(许广平像是男性名字)?或许这是在透露对先生的爱慕之意?从鲁迅收到信的当天晚上就写了回信的行动上看,他是较看重这位不大熟悉的女弟子的。从那以后,他们开始了频繁的鱼雁往来。在随后的女师大事件中,鲁迅与许广平等学生一道同北洋军阀政府展开了无畏的抗争,他们在这一过程中培养了亲密的感情。一得空闲,许广平就来鲁迅家抄写文稿。一日,许广平大胆地握住了先生的手,从此,他们开始了热恋。

许广平是爱得那般地毫无顾忌、热情奔放,而鲁迅则显得有些犹豫。他的处境是十分尴尬。在母亲、妻子、爱人3位女性中,如何才能调整好儿子、丈夫、情人的三重角色,这成了他的一块心病。他瞻前顾后,如履薄冰。他未尝没有休弃元配朱安之意,可一想到母亲那颗脆弱易碎的心,想到朱安被休后的可怜处境,他只好退却。然而,许广平炽热的感情和青春的风采又非轻易就能够从记忆中抹去。他痛苦至极。

鲁迅还受制于传统道德观念和社会舆论的压力。试想,一位年近半百的有妇之夫,爱上了自己年轻的女学生,这会引来多么强烈的轰动效应?事实上,当时鲁迅的一些论敌正是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不断制造流言来诋毁他,说他与许广平“大有双宿双飞之态”^[11]。为了躲开北京的流言和母亲、妻子的无形压力,鲁迅于1926年8月携许广平南下。

在这场爱情角逐中,鲁迅内心也充满了深深的自卑,恐怕他在心里不止一次地做过这样的比较:许广平是充满着青春活力的未婚女子,自己是已有妻室、疾病缠身(患有致命的肺结核病)、年近迟暮之年的人。所以,鲁迅曾经很含蓄地向许广平透露:“我先前偶一想到爱,总立刻自己惭愧,怕不配,因而也不敢爱某一个人。”^[12]后来,鲁迅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更明确地承认了自己面对爱人时的自卑胆怯心理:“其实呢,异性,我是爱的,但我一向不敢,因为我自己明白各种缺点,深恐辱没了对手。”^[13]

知鲁迅者莫过于许广平,她在一封信中直率地对鲁迅说:“你的苦痛,是在为旧社会而牺牲自己。旧社会留给你苦痛的遗产,你一面反对这遗产,一面又不敢舍弃这遗产……于是只好甘心做一世农奴,死守这遗产。”这里所说的“遗产”,具体指的是鲁迅的包办婚姻,面对这份特殊的“遗产”,许广平

作了最大的牺牲，她在这封信的末尾安慰鲁迅说：“如果觉得这批评也过火，自然是照平素在京谈话做去，在新的生活上，没有什么不能吃苦的。”^[14]据专家考证，这所谓的“在京谈话”指的是鲁迅当初与许广平确立恋爱关系时的约定：他无法与她正式结婚，在名分上，他仍保持原来的婚姻^[15]。鲁迅读完许广平这封信后，打消了原先的许多顾虑。

1927年10月初，鲁迅携许广平从广州前往上海，在虹口景云里23号楼，他们开始了正式的同居生活。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从此过上了安定平静的太平日子，流言就像影子无处不在。定居上海不久，一位文学青年致函于鲁迅说：“昨与成仿吾冯乃超诸人同席，二人宣传先生讨姨太太，弃北京之正妻而与女学生发生关系，实为思想落伍者，……”^[16]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结合，竟然被创造社的革命作家视之为娶姨太太，这对于沉醉于欢爱之中的鲁迅和许广平无疑是一种深深的伤害和污辱。

更令鲁迅痛苦的是，面对这种流言，他本应坚决地予以回击，但他只能一直保持沉默，他甚至设法掩盖同居的事实。刚来上海时，鲁迅常对友人说许广平是帮他校对文稿的助手^[17]，他特意将自己的卧室设在二楼，而将许广平安排在三楼居住。不久，鲁迅应邀去杭州做蜜月旅行，他特意订了一间有3张床的大房间，夜里，他要求青年作家许钦文睡在中间那张床上，把自己和许广平隔开^[18]。一向以果敢、勇猛著称的鲁迅，竟然如此地惧怕社会舆论、如此地羞于承认自己与所爱的人的关系。可笑？可怜？可悲？透过这种种“荒唐”的言行，我们窥见了这位“精神界之战士”在爱情抉择上的退缩、怯懦和伤痛。

这种异常的精神状态自然给鲁迅和许广平的同居生活投下了阴影。鲁迅与许广平同居上海的9年是互相扶助、并肩战斗的9年，也是相敬中有伤害、和睦下潜伏着冲突的9年。以往我们遵循“为贤者讳”的传统，不愿承认鲁迅爱情生活中的不和谐成分。事实上，以鲁迅倔强怪诞的脾气，以他们这种非常态的组合，他与许广平难免会像普通夫妇一样磕磕碰碰。据许广平回忆，鲁迅有时会直接对她发火，更多的是一人生闷气，甚至独自躺倒阳台上长时间地不理睬别人^[19]。鲁迅晚年在一封致青年作家萧军的信中透露了他对家庭生活的不满：“……连孩子来捣乱，也很少有人来领去，给我安静一下，所以我近来的译作，是几乎没有一篇不在焦躁中写成的，这情形大约一时也不能改善。”^[20]或许伟人的居家生活与凡人并无二致，柴米油盐、老婆孩子，够鲁迅苦恼的。忆及当年对新生式家庭生活的憧憬，目睹眼前生活的平庸和琐碎，鲁迅的失望和悲哀大概是不难被感知的吧。

受虐与复仇

鲁迅的烦恼和痛苦还来自于他对世道人心的深深失望。鲁迅觉得自己为别人作出那么多的牺牲,却反遭他们的误会、背弃以至暗算,于是他万分悲痛。悲痛之至,使他变成一尊怒目金刚,他举起了复仇的利刃。鲁迅曾向许广平透露自己由爱转向恨的心理动因:“我先前何尝不出于自愿,在生活的路上,将血一滴一滴地淌过去,以饲别人,虽自觉渐渐瘦弱,也以为快活。而现在呢,人们笑我瘦弱了,连饮过我的血的人,也来嘲笑我的瘦弱了。……这实在使我愤怒了。怨恨了,有时简直想报复。”^[21]

鲁迅的受虐心理和复仇倾向的形成,与他的童年经历密切相关。他基本上是在备受压抑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幼时,父亲经常强迫活泼好动的他背诵乏味的经书而禁止他玩耍;少时,祖父科场案发而家道中落,他避难于亲戚家而被称为“乞食者”;为治愈父病,他进出于当铺和药店,受尽世人的冷眼和侮辱……成长于这种严酷环境里的鲁迅,自小就具有受虐体验和复仇冲动。成年后的鲁迅对复仇有了理性的认识,他在《杂忆》中写道:“报复,谁来裁判,怎能公平呢?”便又立刻自答:“自己裁判,自己执行;既没有上帝来主持,人便不妨以目偿头,也不妨以头偿目。”^[22]鲁迅成了现代中国的“复仇之神”。他借助于文学作品,向黑暗残暴的专制体制宣战,向迂腐庸俗的社会势力开火,向诋毁和迫害他的敌人复仇,成了鲁迅生命历程中极富个人魅力的华彩乐章。

鲁迅的锋芒毕露、字字见血的作品戳痛了社会的神经,许多文人学者嘲笑他是睚眦必报、心胸狭窄的“刀笔吏”。鲁迅并不在乎世人的评价,他一再声明,自己活在人世并不断撰文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让仇恨他的人感到“恶心”,“就是偏要使所谓正人君子也者之流多不舒服几天,所以自己便特地留几片铁甲在身上,站着,给他们的世界上多有一点缺陷”^[23]。

复仇的快感令人陶醉。鲁迅的散文诗《复仇》,描写了一种充满着残酷且不乏恶意的人生体验:在广漠的旷野上,站立着一对全身裸露、手持利刃的男女。路人从四面八方汇集此地,等待着鉴赏这对男女互相搂抱的刺激或者互相杀戮的残忍。过了许久,这对男女仍静立着,既无拥抱也无杀戮之意。末了,看客们纷纷觉得百无聊赖,“居然觉得干枯到失了生趣”;而这对男女却以“死人似的眼光,鉴赏这路人们的干枯”,他们决意让路人们“无戏可看”,而自己却“永远沉浸于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中”^[24]。鲁迅正是借助两个裸体男女的形象,向空虚无聊的“看客”、向麻木愚昧的国民复仇,并在这“无血的大戮”中,获得了极度的复仇快意。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然而鲁迅至死也未放弃复仇之念。他在去世前的44天带病写下了《死》一文。文章叙述了他在病中发热时,曾想起了欧洲人临死时的宗教仪式——与别人互相宽恕;他联想到自己“怨敌可谓多矣”,然而他决定“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25]。据许广平回忆,鲁迅去世前几天曾做过一个噩梦,他梦见自己走出家门,看到两旁都埋伏了敌人,他们正欲向他发动进攻;他立即拔出匕首,掷向敌人的身躯^[26]。

这个梦境是鲁迅一生的浓缩写照:他曾为亲人、为朋友、为社会作出了巨大的牺牲,然而他收获的是误解、背弃、迫害……他成了最孤独的人。

鲁迅的爱与恨、悲与欢,连同他的文学创作,构成了现代中国最具魅力的人文景观。鲁迅荷载独行、呐喊彷徨的生命历程,显示了现代人真正的存在价值和精神处境。鲁迅深刻而痛苦的生命体验,宽广而博大的精神人格,丰盈而略微偏执的心理构成,为后人提供了一份研究现代中国人精神状况的标本。

(原载《现代化》杂志1995年第4~5期发表,《读者》(文摘)1995年第8期转载,收入本书时略有删改)

注释:

[1] 鲁迅:《无花的蔷薇》,《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56页(鲁迅作品引文都出自同一版本,以下引文只注卷数和页码)。

[2] 《鲁迅全集》第3卷,第48页。

[3] 《鲁迅全集》第13卷,第196页。

[4] 增田涉:《鲁迅与“光复会”》,《鲁迅研究资料》第2辑,文物出版社,1977年版。

[5] 陈西滢:《致志摩》,《晨报副刊》1926年1月30日。

[6] 《鲁迅全集》第11卷,第442页。

[7] 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60页。

[8] 《鲁迅全集》第14卷,460页。

[9] 周海婴:《鲁迅、许广平所藏书信选》,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43页。

[10] 《鲁迅全集》第11卷,第12页。

[11] 川岛:《和鲁迅相处的日子》,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5页。

[12] 《鲁迅全集》第11卷,第275页。

[13] 《鲁迅全集》第11卷,第660页。

[14] 鲁迅、许广平:《鲁迅景宋通信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41~243页。

[15] 王晓明:《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页。

[16] 王德后:《〈两地书〉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70页。

- [17] 《鲁迅全集》第11卷,第660页。
- [18] 许钦文:《〈鲁迅日记〉中的我》,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17~118页。
- [19] 许广平:《许广平忆鲁迅》,广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72~473页。
- [20] 《鲁迅全集》第13卷,第179页。
- [21] 《鲁迅全集》第11卷,第249页。
- [22] 《鲁迅全集》第1卷,第223页。
- [23] 《鲁迅全集》第1卷,第284页。
- [24] 《鲁迅全集》第2卷,第172~173页。
- [25] 《鲁迅全集》第6卷,第612页。
- [26] 许广平:《许广平忆鲁迅》,广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21页。

被遗忘、被鉴赏、受迫害、被“吃”

——鲁迅对先驱者充当“牺牲”悲剧命运的体认

“牺牲”：名词，古代用来指代充当祭品的牛羊等动物。鲁迅从自身的遭遇出发，提出了一个极其深刻的命题，即：在社会生活中，在文明发展史上，先驱者、改革者往往身不由己地陷入充当“牺牲”角色悲剧性境遇之中。

一、鲁迅本人对充当“牺牲”的体验和看法

鲁迅一生对充当“牺牲”多有体味，其中的两次遭遇尤为值得关注。1911年年底辛亥革命爆发不久，绍兴宣告光复，出任绍兴都督的是革命党人、“绿林好汉”王金发，鲁迅则担任了绍兴师范学校的校长。1912年初，绍兴师范的几名学生对鲁迅等三位社会贤达的名义创办了《越铎日报》。报纸一出版便大骂绍兴军政府和王都督，王金发立即给报社送去500大洋，以图控制报纸的舆论导向。办报的学生们背着鲁迅收下500元钱，但在报上继续骂王都督。鲁迅闻讯前往报社，批评了学生们这种不正当行为，反遭他们的指责；同时，社会上开始有了谣传，说是王金发想杀害鲁迅等人，鲁迅只好前往南京谋生。这几名心术不正的学生借鲁迅的名声办起了报纸，并且狠狠敲了王金发一笔钱，却让鲁迅背上“光拿钱，不干活，反而还骂人”的黑锅，着实让鲁迅当了一回“替罪羊”。^[1]

鲁迅另一次充当“牺牲”的事则是发生在1924年。当时社会上正流行着天花，鲁迅所任教的世界语专门学校学生大多已是20岁左右的人，却有不少还未出过天花，于是该校校医就来动员学生们去种牛痘。然而校医的进展很不顺利，因为大多数学生认为种牛痘是很疼的。鲁迅就在课堂上鼓动学生去种痘，效果并不佳。学生再三商量的结果是公推鲁迅首先去种牛痘。鲁迅此时年已43岁，并且幼年、少年时代已种过3次牛痘，大可不必去当“青年的模范”。不过他想用实际行动说服学生们，于是带着浩浩荡荡的队伍前往医务室。当时正值寒冷的初春，鲁迅脱衣、种痘、穿衣颇费周折，也受了一些寒。完事后鲁迅回头一看，他带来的“青年军”早已溜得一个也不在了^[2]。